

达瓦齐时期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考

陈 柱*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清代准噶尔蒙古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大活动。清朝统治西藏后,严格限制准噶尔与西藏往来。清准关系改善后,准噶尔获得乾隆帝允准,三次遣使赴藏熬茶。此后,乾隆帝便不再允许准噶尔进藏。拉达克紧邻新疆和西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兴盛。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后,乾隆十八、十九年两次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试图交通西藏。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件满文档案为基础,结合清代其他档案文献,对此进行考察和梳理。

[关键词] 准噶尔 拉达克 达瓦齐 熬茶 西藏 满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 K2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5) 03-0033-13

清代准噶尔蒙古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西藏有着密切关系,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大活动。准噶尔与清朝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状态,清朝统治西藏后,严格限制准噶尔与西藏往来。清准关系改善后,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和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获得乾隆帝允准,先后三次遣使赴藏熬茶。此后,清廷便不再允许准噶尔进藏,准噶尔与西藏的联系再次被切断。拉达克北接新疆,东邻西藏,是新疆、西藏与南亚地区相互往来的通道,地理位置显要。拉达克与新疆以喀喇昆仑山为界,中有众多山口相通,彼此间一直存在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其居民多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与西藏在政治、经济和宗教各方面联系紧密。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后,乾隆十八、十九年两次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试图通过拉达克交通西藏。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件满文档案为基础,结合清代其他档案文献记载,对达瓦齐遣使赴拉达克熬茶一事原委进行考察和梳理。

一、拉达克王国与西藏的关系

拉达克古称玛域(或作芒域),是古象雄之地,在西藏吐蕃王朝时期为“六茹”之一“象雄茹”的一部分。拉达克王国的建立与吐蕃王朝的衰亡密切相关。公元 842 年,吐蕃赞普朗达玛(gLang—dar—ma)被杀,吐蕃王朝土崩瓦解,西藏进入分裂混乱时期。9 世纪末,朗达玛曾孙吉德尼玛衮(sKyid—lde—nyi

* [作者简介] 陈柱(1984—),男(汉族),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新疆史、蒙藏关系史。

—ma—mgon)逃到象雄的布让(今西藏普兰),娶象雄统治家族没庐氏女为妻,收服象雄各部,统称“阿里”,建立割据政权。没庐氏为尼玛衮育有三子,尼玛衮将长子贝吉衮(dPal—gyi—lde—rig—pa—mgon)分封到玛域(拉达克),次子扎西衮(bKra shis mgon)分封到布让,三子德祖衮(lDe—gtsug—mgon)分封到古格(今西藏日土,此后象雄专指古格一地),史称“阿里三围”或者“上部三衮”。三人及其后裔分别在各自封地内进行统治,逐渐形成玛域(拉达克)王国、布让王国和古格王国三个割据政权。^①可见贝吉衮是拉达克王国王室的始祖,拉达克王室是吐蕃赞普后裔。拉达克王国建立后未曾中断,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被克什米尔吞并。

“阿里三围”的分裂割据是当时西藏整体分裂混乱局势的结果和反映。至13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高原,重新统一西藏,西藏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才告终结,“阿里三围”也重新统一于西藏。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西藏全境政教事务。都元帅府下设“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管辖“阿里三围”玛域(拉达克)、古格和布让三地,“纳里速古鲁孙”即藏文“阿里三围”音译。元亡之后,明朝对西藏的管辖较为松散,主要实行羁縻统治,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其中后者即统辖包括拉达克在内的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②

明末清初,中原鼎革,疏于顾及西藏,西藏各地方势力和教派之间纷争不已。在此期间,藏传佛教格鲁派日益壮大,与占统治地位的噶举派势力矛盾激化。在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的援助下,格鲁派打倒噶举派,消灭其他敌对势力,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和硕特汗廷与达赖喇嘛等格鲁派上层联合统治的西藏地方政权。此时拉达克王室尊奉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因教派差异,加之正在经略克什米尔地区的莫卧儿帝国的威胁,拉达克倒向莫卧儿帝国,公开对抗西藏地方政权和格鲁派,并对西藏西部地区怀有野心,出兵占领阿里的古格等地。^③

1670年代,因尊奉竹巴噶举派的布鲁克巴(今不丹)迫害当地格鲁派,和硕特汗廷及达赖喇嘛对布鲁克巴发动战争。拉达克王向以竹巴噶举派保护者自居,拉达克王德勒南杰(bDe—legs—rnam—rgyal,约1675—1691年在位)指责西藏攻打布鲁克巴,扬言要进攻拉萨。为此,和硕特汗廷及达赖喇嘛与布鲁克巴达成和解,于康熙十八年(1679)派遣和硕特贵族噶丹次旺巴桑波(dGa’—ldan—tshe—dbang—dpal—bzang—po)^④统率蒙古骑兵和藏兵征讨拉达克。西藏军队很快收复被拉达克占领的阿里地区,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攻入拉达克境内,不久即占领拉达克首府列城,征服拉达克大部分地区。于是德勒南杰向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克什米尔地方长官伊卜拉欣·汗(Ibrahim Khan)求援。克什米尔派军进入拉达克,噶丹次旺军作战失利,后撤至拉达克东部边境附近。战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克什米尔迫

① 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54—55页;尊胜:《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附:谈“阿里三围”)》,《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第55页。关于自朗达玛被杀至尼玛衮分封三子形成“阿里三围”的详细经过,可参看[意]伯戴克(Luciano Petech):《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二)——拉达克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彭陟焱译、扎洛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6—20页。关于朗达玛被杀年代,一般作842年,周伟洲先生文中作841年。

② 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第55—56页。

③ 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第56页;陆水林译:《〈查谟史〉摘译》,《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第109—110页;陈庆英:《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第82页。

④ 噶丹次旺系顾实汗次子达赖珙台吉长子,当时和硕特汗王达赖汗的堂兄,又译作噶登策旺贝桑布、甘丹次旺、噶尔丹策旺等。关于噶丹次旺,参看[意]伯戴克:《一六八一至一六八三年西藏、拉达克以及莫卧儿的战争》,汤池安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1995年第1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13—214页;[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22页。

使拉达克向莫卧儿皇帝纳贡,改宗伊斯兰教,在境内修建清真寺,并派遣人质。克什米尔援军撤走后,噶丹次旺再次率军进攻拉达克,据说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也派军增援。噶丹次旺军重新占领拉达克,拉达克投降。^①拉达克臣服于异教的莫卧儿帝国,改宗伊斯兰教,严重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利益和拉达克自身的利益,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都决定议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竹巴噶举派领袖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Mi-pham-dbang-po)主持下,西藏地方和拉达克达成协议,重归和好,除在贸易方面互惠互利外,在政治和宗教上,拉达克臣属于西藏,阿里地区收归西藏地方,西藏退还所占拉达克土地;拉达克放弃伊斯兰教,坚定佛教信仰;定期向拉萨派遣“年贡使”(洛恰,藏语 lo phyag,西文 lapchak),向西藏地方政权和达赖喇嘛进献贡物,并向拉萨的僧俗上层和各大寺庙供奉礼品。这样,拉达克重新成为西藏藩属,受西藏管辖,西藏地方也将阿里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②

二、拉达克王国与清朝及准噶尔的关系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汗国首领策旺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军入侵西藏,袭杀和硕特汗王拉藏汗,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终结。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入侵势力。自此,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统治之下,作为西藏藩属的拉达克也开始收归清朝管辖。由于清朝并不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而将西藏作为藩部,实行一套符合西藏政教情况的独特政治制度,故拉达克在清朝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也颇具特色。清廷将其作为“藩属的藩属”,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清廷的指示代为管辖,西藏地方政府成为清廷与拉达克地方沟通联络的中介。

拉达克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清朝获取新疆准噶尔部、回部及周边地区情况的重要途径。清朝档案和官书对此多有记载。如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1724),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Nyi-ma-rnam-rgyal)派遣使臣来到拉萨,与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使臣一道进北京朝贡。^③又载,雍正十年(1732),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与贝子康济鼐同心报效。”^④尼玛纳木扎尔之子德中纳木扎尔继位后,继续效忠清朝,为清廷“探取叶尔启木、准噶尔处信息,报知贝勒颇罗鼐转行奏达”,“与贝勒颇罗鼐一体效力,甚属勤劳”^⑤。可见,拉达克归顺清朝不久,清廷就开始利用拉达克打探准噶尔和回部的消息。乾隆帝继位后,随着清朝对西藏统治的加强和经略西北的推进,拉达克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紧密。

康熙十九年(1680)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后,拉达克成为准噶尔汗国的邻居,双方关系逐渐展开。随

① [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第23页。

② 关于1681—1683年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的战争及1684年西藏与拉达克协议详情,参看[意]伯戴克:《一六八一至一六八三年西藏、拉达克以及莫卧儿的战争》,汤池安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1995年第12辑,第207—236页;[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第21—24页;陆水林译:《〈查谟史〉摘译》,第106—108、110—111页;陈庆英:《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第82—84页;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第56—57页。另,徐亮:《1684—1842年拉达克与中国西藏的政治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年)一文对此也有论及,可参考。

③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一,雍正二年六月乙未。也可参看[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六)——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拉达克》,彭陟焱译、扎洛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0页。尼玛纳木扎尔在乾隆朝实录中译作“呢玛那木扎尔”,其他文献中又译作尼玛南杰、尼玛南嘉、尼玛朗加等。伯戴克认为其统治年代开始于1691年,并于1729年让位于其子德迦南杰(即清朝文献中的德中纳木扎尔、德忠那木扎尔,其他文献中又译作德炯南嘉、德中朗加等),见上文第7、12页。拉达克王在清朝文献中被称为“拉达克汗”。

④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六,雍正十年三月己卯。

⑤ 同上。“叶尔启木”系清朝对“叶尔羌”的早期汉译。

后的1681至1683年西藏与拉达克战争中,噶尔丹还曾出兵援助蒙藏联军统帅和硕特部贵族噶丹次旺征讨拉达克。战后,拉达克成为西藏臣属,准噶尔与拉达克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清朝严禁准噶尔与西藏往来。为了保持与西藏的政教联系,准噶尔积极发展与拉达克的关系,多次派人到拉达克打探西藏情况,试图交通和联络西藏。清廷则对此严加防范。雍正朝后期清朝与准噶尔关系改善后,准噶尔三次获准进藏熬茶,同时仍保持着与拉达克的交往。

三、清朝统治西藏与准噶尔赴藏熬茶

熬茶是指藏传佛教信徒到藏传佛教寺庙礼佛和发放布施,通常由熬茶者向寺庙众喇嘛布施酥油茶和钱物,众喇嘛则为之唸经祈福。准噶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其他各部一样,17世纪初即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成为格鲁派的虔诚信徒,与藏传佛教圣地西藏发生紧密关系。此后,赴藏熬茶礼佛成为准噶尔等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一项重要活动,17世纪40年代以后获得较大发展。在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统治青藏高原时期,准噶尔与西藏进行熬茶等交往比较便利和自由,学界对此已有过研究。^①康熙朝以来,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状态。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首领策旺阿喇布坦派军入侵西藏,推翻和硕特汗廷,控制西藏长达三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势力,将西藏纳入统治之下,自此严厉防范准噶尔与西藏往来,准噶尔赴藏熬茶被禁绝。雍正五年(1727),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成为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与清朝先后发生和通泊之战(雍正九年,1731)和额尔德尼召之战(雍正十年,1732)两次大战,双方各有胜负。额尔德尼召之战后,双方都有意缓和长期的紧张关系,着手谈判划分准噶尔与清朝所辖喀尔喀蒙古之间的游牧界。自此双方关系得到改善,进入长达二十余年的和平交往时期。乾隆四年(1739),双方最终勘定界址,此后频繁开展互派使者、大规模贸易等多方面往来,准噶尔重获赴藏熬茶的机会。这一时期,准噶尔先后三次获得清廷允准遣使赴藏熬茶。准噶尔第一次熬茶使半途而返,并未进藏,实际赴藏熬茶只有两次。分别印行于2009年和2010年的《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②(所收档案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和《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③(所收档案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五月至乾隆十三年四月)两部档案集为研究和平时期的清准关系、准噶尔史和蒙藏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丰富的史料,也为复原此一时期准噶尔赴藏熬茶的详情提供了便利,引起学界重视。关于此三次准噶尔赴藏熬茶详见后文。

四、两件满文档案所载达瓦齐遣使赴拉达克熬茶

笔者在查阅清代边疆满文档案时,意外发现两件关于达瓦齐统治时期准噶尔派遣使者赴拉达克熬茶的满文奏折,一件是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

① 参看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281页;达力扎布:《略论16—20世纪蒙古“进藏熬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4年第7辑,科学出版社,第349—371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①，一件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②。两件档案既未见于《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也未见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其内容在《清实录》中也没有记载。它们反映的历史原委是怎样的呢？下文笔者试图结合清代相关档案文献，解析两件档案内容，对此事进行考察和梳理。

（一）两件满文档案汉译^③

1. 档案一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汉译：

奏。奴才多尔济、舒泰谨奏。为奏闻事。驻防阿里地方之第巴索冈鼐等呈称：“派至拉达克地方探信之人来报：‘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等十人、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十五人二月十五日来拉达克，探问土伯特地方消息，至拉达克寺庙熬茶。’为此，我等将所闻之事呈报。”嗣后达赖喇嘛告称：“派至拉达克买果子之人来告我等：‘我等与来拉达克之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会于市集。吹扎布问我等为何事而来，答曰：我等为买果子而来，尔等为何事而来。彼等曰：我等来拉达克地方熬茶，土伯特地方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安否？有否广兴黄教？众人俱敬奉达赖喇嘛否？噶布伦以下人众俱好否？我等答称：土伯特地方蒙大皇帝之恩，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福佑，广弘黄教，生活甚为安逸。我等又问彼处人众是否安好，彼等告称：我台吉喇嘛达尔扎行事凶暴，欲杀达瓦齐。达瓦齐闻后，躲至边地。后达瓦齐不忍厄鲁特人众败坏卫拉特之道带兵抓捕喇嘛达尔扎，成为台吉。现我台吉达瓦齐敬奉经教，甚为太平，众喇嘛广弘佛经云云。彼等熬茶贸易完毕，即起程归去。’准噶尔之人甚为狡诈，除此外，并未告知别情。此等语，拉达克之人亦皆相告。我等将所闻之事呈献，日后详加访察，如另有消息，再行呈报。”奴才我等嘱驻阿里地方之第巴索冈鼐等：“尔等仍于拉达克地方差派良善信实之人，若拉达克汗、其头目另有消息，即切实探访后来报。”如此交付差派。此外，达赖喇嘛自今年十二月初五日坐禅，翌年正月二十日出定。为此谨奏。

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 档案二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汉译：

奏。奴才萨喇善、舒泰谨奏。为奏闻事。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遣卓尼尔向我等送来蒙古文书札，内称：“自拉达克汗地方经驿道寄送达赖喇嘛之书内称：‘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等

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9册，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6—41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中，除新疆卷载录该档案外，综合卷西藏类也载录该档案，见该书第12册综合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②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9册，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第228—231页。《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除新疆卷外，综合卷西藏类也载录该档案，见该书第12册综合卷，第41页。

③ 两件满文档案汉文均为笔者所译。

七人、叶尔羌地方商回阿都尼萨尔伯克等十人,于今年十月初六日至拉达克地方,因彼等地方之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病歿而来熬茶。据彼等称,此前因欲请土伯特地方之堪布一名,曾奏请大皇帝,然并未获准。现想是复派四人前去上奏矣。达瓦齐仍任台吉,有子一人。吹扎布等于十月二十日起行返回。’再,自我等藏地派驻拉达克地方贸易之人呈称:‘小人我等二人于九月初五日至拉达克地方。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等七人、回子阿都尼萨尔伯克等十人,于十月初六日至拉达克地方。叶尔羌地方商回等来者亦多。我等与吹扎布相遇,吹扎布问我等:尔等今年又来买果子否?我等答称:是来买果子。又问:尔等土伯特地方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安好否?有否弘扬黄教?众人俱敬奉达赖喇嘛否?噶布伦以下人众俱好否?我等曰:土伯特地方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福佑,广弘黄教,生活甚为安逸。尔等地方一切俱好否?彼等称:我台吉达瓦齐身体甚好,诸官皆各司其事,哈萨克、布鲁特等仍照旧纳赋。因我等地方之喇嘛根敦达克巴圆寂,故来拉达克寺庙熬茶。我等地方之众喇嘛、诸官俱愿衷心奏大皇帝,欲遣人往土伯特地方熬茶做佛事。然因无大皇帝旨意,亦属无奈等语。再,拉达克地方之人暗中告知我等:听得,因准噶尔地方人众不和,一千五百余户人口俱诚心往求大皇帝。吹扎布等熬茶完毕,于十月二十日返回。’如此寄书。再,驻阿里地方之第巴等探获消息所寄书,亦与所遣买果子二人之书一致。故送来告知大臣等。”拉达克汗甚属恭敬,亲将所闻准噶尔消息经由驿道诚心致书达赖喇嘛。故奴才我等告知卓尼尔转告达赖喇嘛,仍由达赖喇嘛处向拉达克汗寄书一封,命其此间若另得准噶尔消息,切实探访后寄送达赖喇嘛。此外,其间或驻阿里地方之第巴等另得消息来报,或所遣买果子之人返回后有确实消息,再另奏闻。为此谨奏。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 两件满文档案内容解析

两件满文档案中出现“土伯特”“台吉”“卓尼尔”“堪布”等词。“土伯特”是清朝对西藏地方的通称。“台吉”有时又作“珙台吉”,是准噶尔蒙古最高首领的名号。“卓尼尔”是清代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中级僧官。“堪布”则是藏传佛教地区精通经典、担任寺院或扎仓(藏僧学习经典的学校)的住持,担任“堪布”的僧人多是获得藏传佛教格西学位的高僧。

可以看出,两件档案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信息:准噶尔使者在拉达克的活动;西藏地方探取这一信息的三个渠道;驻藏大臣将情况奏报乾隆帝。第一方面的信息是这样的: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十五日,当时准噶尔汗国首领达瓦齐所派使者准噶尔人额木齐吹扎布等10人、天山南路叶尔羌的达尔罕伯克等15人一行来到拉达克打探西藏消息,进行贸易,并到拉达克的寺庙熬茶。当时西藏正值七世达赖喇嘛在位,经常派遣西藏人到拉达克贸易,购买果品等物,额木齐吹扎布一行正好在集市上遇到这些西藏贸易人员。双方进行了交谈,彼此询问来拉达克的缘故及各自地方的情况。额木齐吹扎布等人似乎知道这些贸易人是西藏来的,向其询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噶布伦以下人众是否安好,西藏黄教的发展情况如何,以及西藏人众是否敬奉达赖喇嘛。西藏贸易人员巧妙地作了回答并反问准噶尔的情况,额木齐吹扎布等人告知达瓦齐带兵推翻了台吉喇嘛达尔扎的统治,成为准噶尔首领。

乾隆十九年(1754),达瓦齐再次派遣使者到拉达克打探西藏消息并熬茶。这次达瓦齐所派使者是准噶尔人额木齐吹扎布等7人、叶尔羌地方商回阿都尼萨尔伯克等10人,他们在当年十月初六日到达拉达克。据称,他们这次来是为准噶尔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的圆寂熬茶做佛事。根敦达克巴在准噶尔应当颇有地位,是某个大寺的堪布,但尚不清楚其具体情况。额木齐吹扎布等告知拉达克王,准噶尔曾向乾隆帝奏请从西藏延请一名堪布喇嘛到准噶尔,但未获批准。额木齐吹扎布一行又与七世达赖喇嘛派到拉达克贸易之人相遇,如同上次一样彼此询问对方来由及各自地方情况。除额木齐吹扎布等所告

准噶尔情况外,其余问答内容均与前次相同。额木齐吹扎布等告诉西藏贸易之人达瓦齐身体很好,准噶尔地方政治安定,所属哈萨克、布鲁特仍旧顺服;由于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圆寂,所以来拉达克熬茶做佛事。他们表示,准噶尔僧俗人众都衷心向乾隆帝奏请去西藏熬茶做佛事,但得不到乾隆帝允准,很是无奈。十月二十日,额木齐吹扎布一行起程离开拉达克返回。

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就已征服新疆天山南路的回部,当地穆斯林都成为准噶尔属民。由于这些穆斯林善于经商,因此准噶尔专门组织了由他们组成的官商集团,四出贸易获利,积累财富。乾隆六年和乾隆八年准噶尔两次派遣使者赴藏熬茶,都随带了众多“办理贸易事务回人”^①,先在青海东科尔贸易,换取熬茶布施所需钱物后再进藏。这些“回人”就是上述性质的准噶尔官商。达瓦齐两次遣使到拉达克熬茶都有众多叶尔羌的穆斯林商人陪同,并在拉达克进行贸易,可以推测这些穆斯林商人也是通过贸易为准噶尔在拉达克熬茶换取钱物。

两份档案都没有提及当时拉达克王的名字。根据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的研究,雍正七年(1729)德迥南杰(bDe-skyong-rnam-rgyal)继承拉达克王位^②;乾隆四年二月(1739年3月),德迥南杰去世,其子彭措南杰(Phun-tshogs-rnam-rgyal)继位^③;乾隆十八年三月二十日(1753年4月23日),彭措南杰让位于其子次旺南杰(Tshe-dbang-rnam-rgyal)^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1782年6月),次旺南杰让位于长子次旦南杰(Tshe-brtan-rnam-rgyal)^⑤。第一件档案只交待了达瓦齐使者到达拉达克的时间,即乾隆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753年3月19日),参照伯戴克的研究可知当时拉达克是彭措南杰在位。该档案没有记载达瓦齐使者离开拉达克的时间,只称“彼等熬茶贸易完毕,即起程归去”,可见他们在拉达克停留时间并不长。第二件档案记载乾隆十九年达瓦齐使者于十月初六日(1754年11月19日)到达拉达克,十月二十日(12月3日)离开,可知当时拉达克王已是次旺南杰。此次达瓦齐使者在拉达克只停留半个月,据此推测,乾隆十八年达瓦齐使者在拉达克停留时间应相差不远,彭措南杰让位于次旺南杰在乾隆十八年达瓦齐使者抵达拉达克之后第35天,可以断定彭措南杰退位前达瓦齐熬茶使者应该已经离开。因此达瓦齐两次遣使到拉达克熬茶时拉达克王分别为彭措南杰和次旺南杰。

两份档案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获得准噶尔使者在拉达克活动情况的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拉达克王直接将情况报告给达赖喇嘛。由第二份档案可知从拉萨到拉达克有专门的驿道,为彼此的交通往来提供了便利,乾隆十九年拉达克王就是通过这条驿道将情报寄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第二个渠道是达赖喇嘛常向拉达克派遣贸易人员,购买果品等物资,这些人实际上也是情报人员,随时将在拉达克获取的关于新疆的重要消息传送到拉萨。此两次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时,七世达赖喇嘛所派贸易人员竟然都与准噶尔使者遭遇。通过与准噶尔使者的交谈,他们不仅将清廷想要向准噶尔宣传的西藏的情况直接传达给准噶尔,也直接获得准噶尔方面的情况(包括准噶尔意欲向清廷传达的信息)。除了向准噶尔使者直接了解新疆的情况外,这些贸易人员还通过其他方式探取新疆的情报。如第二份档案提到,当时拉达克民众暗中将听闻的准噶尔情况告诉他们:“因准噶尔地方人众不和,一千五百

① 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第268页。

② [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六)——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拉达克》,彭陟焱译、扎洛校,第12页。

③ 同上文,第13页。

④ 同上文,第15页。文中称次旺南杰同时也是彭措南杰之兄萨迥南杰(Sa-skyong-rnam-rgyal)之子,并讨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见该文第16页。陆水林先生译《〈查谟史〉摘译》一文也提到次旺南杰(文中译作才旺南嘉)是萨迥南杰(文中译作萨炯南嘉)之子,见《〈查谟史〉摘译》第114页。关于次旺南杰在拉达克王系中的位置,可参看尊胜:《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附:谈“阿里三围”)》,第57—58页,文中译作泽旺朗加。

⑤ [意]伯戴克:《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七)——拉达克力量的衰退》,扎洛译、彭陟焱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21页。

余户人口俱一心往求大皇帝。”第二个渠道获得的信息最为丰富。拉达克王及西藏贸易人员将情报呈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再将情报告知驻藏大臣。第三个渠道是驻西藏阿里地区的长官第巴向拉达克派遣探子获取情报,这也是西藏地方获取新疆情报的重要途径。阿里与拉达克接壤,具有地理上的优势。阿里的第巴接到探报后即呈报给驻藏大臣或者达赖喇嘛。

驻藏大臣获得三个方面的情报后,经过比较和甄别,将详情如实奏报乾隆帝。通过三个渠道获得的情报会存在详略、真伪等差异,有的情报可能并非三个渠道都能同时获得,因而综合三个渠道所获情报进行比较、甄别和互补,才能得到较为接近事实的全面信息。当时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知此两次准噶尔赴拉达克熬茶情况的。从清代档案文献记载来看,这三个渠道一直是雍正时期和乾隆前期西藏地方通过拉达克探取新疆情报的重要途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前期西北疆域开拓过程中搜集情报方式的灵活多样。

五、达瓦齐时期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的背景

(一)乾隆朝准噶尔三次赴藏熬茶概况

准噶尔部众笃信黄教,尊崇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藏熬茶礼佛是其一项重要活动。雍正后期清准关系改善后,从乾隆四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十年间,准噶尔先后三次获得乾隆帝允准并派遣使者赴藏熬茶。第一次发生在乾隆六年。先是,乾隆二年(1737)七月,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札什伦布寺圆寂。乾隆三年十二月,噶尔丹策零派遣哈柳率使团进京奏请允准准噶尔赴藏熬茶,为五世班禅做佛事。乾隆帝没有拒绝,允许准噶尔100名使者进藏。但噶尔丹策零不满足于这一人数,乾隆四年初再次遣使进京请求将人数增加到300人,也为乾隆帝所批准。^①经过两年往返商议和准备,乾隆六年(1741)正月,准噶尔宰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商卓特巴喇嘛多约特禅机率领三百人熬茶使团抵达哈密;在凉州将军乌赫图护送下四月初到达青海东科尔,开始贸易,准备贸易完毕后进藏熬茶。可是,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中,准噶尔使团除了贸易和在青海塔尔寺等处寺庙熬茶外,并无意进藏,借口贸易不顺一再拖延入藏时间。到七月下旬货物全部售罄时,齐默特等又以西藏道路险峻、天气寒冷、所带牲口不堪任用为由,不顾清朝官员反对,仍不愿前往西藏。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准噶尔使团八月底起程返回。^②因此,准噶尔此次赴藏熬茶并未实现。

因乾隆六年准噶尔赴藏熬茶半途而返,乾隆七年(1742)正月和十月,噶尔丹策零又以为其亡父策旺阿喇布坦熬茶做佛事为由,先后两次派遣吹纳木喀出使北京奏请再次赴藏熬茶。乾隆帝早有预料,批准了准噶尔的请求。乾隆八年(1743)六月底,噶尔丹策零派遣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为首率领300余人熬茶队伍抵达青海东科尔贸易,清廷选派侍郎玉保、将军乌赫图护送和照管。因有前一次的经验教训,在清朝官员引导下,准噶尔使团很快贸易完毕,于九月下旬赶到西藏,然后前往前后藏主要寺庙熬茶布施。十二月初,准噶尔使团圆满完成熬茶任务,从拉萨起程返回,期间共布施黄金四百余两、白银十五万七千

^① 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68页;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64—65页;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1页。

^② 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六,乾隆六年八月丙申;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63、68页;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第66—67页;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第43—44页。

多两。^①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发生大瘟疫。当年九月噶尔丹策零染病于伊犁去世,其次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继承汗位,不久准噶尔即陷入内乱。十一年(1746)初,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派遣使臣哈柳进京奏请为其亡父噶尔丹策零入藏熬茶做佛事,于三月抵京。乾隆帝早在十年十一月间就已听闻噶尔丹策零死讯,对其颇感惋惜。对于哈柳的奏请,乾隆帝很快允准。^②十一年十二月,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又派遣使臣玛木特进京,最终商定进藏熬茶的具体时间、路线。十二年(1747)六月,准噶尔宰桑巴雅斯瑚朗率领300余人使团自伊犁出发,经天山南路进藏,因渡塔里木河时遭遇河水泛滥,迟至九月下旬才抵达预定的贸易地点得卜特尔,随即展开贸易。清廷派遣侍郎玉保护送和照管。贸易完毕后,十一月中旬玉保带领准噶尔使团赴藏,十二月中旬抵达西藏。至十三年(1748)二月下旬,准噶尔使团方才熬茶布施完毕,于三月初离藏返回。此次熬茶布施准噶尔共花费黄金四百余两、白银十九万四百余两。^③

(二)乾隆帝不再准准噶尔赴藏熬茶

1. 乾隆帝不再准准噶尔赴藏熬茶

乾隆十三年准噶尔使团在西藏熬茶完毕返回后,三月十八日乾隆帝即向负责护送和照管准噶尔使团的玉保下达谕旨:“嗣后彼等若再请赴藏熬茶,勿轻许准行。”^④准噶尔使团离开西藏时,为日后到色拉寺、哲蚌寺等寺庙熬茶预留了数万两银钱。当时驻藏大臣索拜和傅清担心准噶尔再来西藏熬茶,于是询问刚继承其父颇罗鼐职位不久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的看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表示:

准噶尔人性善欺诈,拉藏汗时,彼等潜入西藏,杀戮众喇嘛,破坏佛教,阖藏喇嘛、唐古忒人众无所不知。是故,彼等无论如何为利裨黄教慷慨布施,各寺庙众喇嘛惟念昔日之痛猜忌而已,并无因获布施欣喜、感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人。再,准噶尔人等往来及住藏期间,我等唐古忒人等每日备办彼等骑驮之牲畜马牛、喂养马畜之草料、柴薪等,只是受累而已,毫无益处。……此次所来准噶尔使臣等彼此不和,且又不能管束属众,故与前次不同。喇嘛斋桑亦较狂妄,日后意欲扰害我土伯特地方,亦未可料。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倘复奏请派使赴藏熬茶,若蒙洞鉴不允,与我唐古忒之众极有利裨。^⑤

可见,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并控制西藏三年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给西藏僧俗人众留下深刻阴影和伤痛,三十年后的乾隆十三年,当地人仍然无法对此释怀,对准噶尔人深怀不满和疑忌。虽

① 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248页;蔡家艺:《清代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关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63、69页;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2012年第12期,第270—271、273—275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九,乾隆十一年三月乙亥、壬午、甲申。

③ 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250页;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第271—275页;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69页(叶文认为此次熬茶使团人数为200人,有误);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始末》,《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2期,第4—7页。关于布施的黄金、白银数量,蔡家艺先生《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一文作黄金四百二十二两三钱、白银十九万四千四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始末》一文作黄金419.3两、白银173587.805两。此处白银数量据蔡文。

④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册,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谕为嗣后准噶尔再请赴藏熬茶勿轻许准行事》,第429页。

⑤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84,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复请赴藏熬茶不宜再准折》,满文见第1521—1525页,汉译文见第1529页。该书在汉译文第1529页将档案朱批时间“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三日”误作上奏时间。

然准噶尔赴藏熬茶给西藏的寺庙和喇嘛布施了大量钱财,但也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负担,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明确表示准噶尔入藏熬茶对西藏“只是受累而已,毫无益处”。因此西藏上自大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不愿准噶尔再来西藏熬茶。有鉴于此,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驻藏大臣索拜和傅清向乾隆帝上奏建议日后不宜再准准噶尔人赴藏熬茶:“以臣愚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唐古忒人等委实辛苦,郡王珠密那木扎勒极不乐意。嗣后倘若不准准噶尔人等赴藏,则于土伯特地方甚有利裨。”^①

乾隆帝在当年五月收到奏折后,随即向索拜和傅清降旨,晓谕和安抚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表示日后要严行拒绝准噶尔人为寻常事进藏:

准噶尔人等狡诈,断不可信,倘若仍令来往于藏,久而久之,必致纷扰。珠密那木扎勒所虑者是。此二次准其所请赴藏熬茶,特因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策妄阿喇布坦、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屡屡虔心奏请,彼等为父祈福,不便不准,故朕恩准施行,焉能照准其寻常之事。嗣后准噶尔人等遇有此等之事,仍请赴藏熬茶,不得已尚准其请。倘非此等之事,为寻常之事祈福,断不准行。^②

谕旨表明,清廷日后不再允许准噶尔为寻常之事进藏,除非像噶尔丹策零和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那样为其亡父熬茶做佛事这种“大事”。但从此后情况来看,不管准噶尔以任何理由奏请,清廷都未再允许准噶尔入藏。

乾隆十四年(1749)冬,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准噶尔汗国早先从西藏延请来的喇嘛大多年老或亡故,遣使臣尼玛进京奏请每年派人赴藏熬茶、学经礼佛,尼玛等于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初抵京。^③从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上奏的表文来看,他曲解了乾隆帝此前所降准噶尔须有“大事”才能入藏熬茶的谕令,乾隆帝的意思是准噶尔首领为其去世父汗熬茶做佛事这种“大事”才能允准进藏,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理解为只要有“大事”就能进藏,于是以“弘扬黄教”为准噶尔“大事”,请求以后每年都进藏。^④乾隆帝接见了尼玛一行,重申了此前的原则,并以准噶尔人进藏路途遥远艰苦、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对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清朝官兵护送照看劳烦为由,拒绝了准噶尔的请求。乾隆帝建议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可以选派准噶尔喇嘛到北京的寺庙学经,这里有很多德高望重的呼图克图和来自西藏的得道喇嘛,与在西藏学经无异。^⑤为此,乾隆帝还专门向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下达一份谕旨申明此事。^⑥尼玛等遂于二月初起程返回准噶尔。

2. 喇嘛达尔扎时期

(1) 喇嘛达尔扎第一次遣使北京

不久,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即在当年被其庶兄喇嘛达尔扎废杀,喇嘛达尔扎登上准噶尔汗位。喇嘛

① 同上书,满文见第1525—1527页,汉译文见第1530页。

②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85,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嗣后准噶尔等倘为寻常事请求赴藏则不准》,满文见第1532—1533页,汉译文见1535页;《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丙戌。《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8册,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傅恒寄信驻藏大臣索拜为嗣后限制准噶尔部进藏熬茶事》与熬茶档所载为同一档案,对应内容见该档案汇编第30页。

③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398,《主事诺木浑为使臣尼玛等已由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第2665—2666页;405,《主事诺木浑等为报使臣尼玛等抵京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第2669页;407,《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每年派人赴藏熬茶事奏书》,第2670页。

④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07,《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每年派人赴藏熬茶事奏书》,第2670页。

⑤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17,《丰泽园筵宴尼玛面降谕旨不准派人赴藏习经记注》,第2676—2677页;419,《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转宣尼玛不可每年派人至藏习经片》,第2678—2680页。

⑥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36,《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准派喇嘛至京习经》,第2692—2693页。

达尔扎很快在当年冬派遣使臣宰桑额尔钦、尼玛等到北京朝贡,并奏请进藏熬茶礼佛,延请喇嘛。额尔钦等在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底抵京,正值乾隆帝南巡,于二月底在苏州受到接见^①。喇嘛达尔扎仍以赴藏熬茶礼佛为准噶尔“大事”,请求派人进藏,乾隆帝坚持此前的原则,以喇嘛达尔扎赴藏熬茶并无名分,予以驳斥:“蒙古遣人赴藏熬茶者,均为报答彼等亡故父母之恩情。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均为报答其父之恩而遣人耳。今喇嘛达尔扎之请,为报答何人之恩?愿报答尔等前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恩乎?若为伊自身,才承其位,好端端生时即遣人赴藏乎。再,于达尔扎此等非要紧之事上,朕岂有屡次派官兵照管之理?此等事断不准行。”^②“熬茶之事并非俗规,前尔已故台吉噶尔丹策零为其父台吉策旺阿喇布坦,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台吉噶尔丹策零,奏请赴藏熬茶诵经,此皆欲追报先人,理应准行,故准其所请,又加恩沿途补赏牲畜盘费,特派大臣官员照管。彼时朕即降旨,尔等台吉因有此大事,朕方允行。若无大事,断然不许,所降谕旨甚明。”^③于是,额尔钦在觐见时,又以喇嘛达尔扎新近继承准噶尔汗位为由,请求进藏。乾隆帝认为并没有准噶尔新汗继位即派人进藏熬茶的惯例,驳回了额尔钦的请求。^④

喇嘛达尔扎在奏表中表示不便从准噶尔选派喇嘛到北京学经,而奏请从西藏或者北京延请四五名贤能喇嘛到准噶尔教习佛经,乾隆帝断然拒绝从西藏延请喇嘛,勉强同意从北京延请,但表示当年不便立即选派,此后将从西藏拣选若干有德行喇嘛到京,等准噶尔下次遣使来奏请时再派遣,在使臣返回时一同带去。^⑤

(2)喇嘛达尔扎第二次遣使北京于是,喇嘛达尔扎遵照乾隆帝指示,又于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派遣使臣图卜济尔哈朗等进京,祈求从北京延请三位呼图克图中的一名、西藏索尔巴噶勒丹锡呼图一名到准噶尔,又以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做佛事为由奏请派人赴藏熬茶。^⑥图卜济尔哈朗等于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中旬抵京,受到乾隆帝接见。对于第一个请求,乾隆帝表示在京呼图克图各有职司,不能派遣,建议延请清廷专门从西藏拣选到北京的十位有德行喇嘛;至于西藏索尔巴噶勒丹锡呼图,已经在当年亡故,更无从派遣。由于喇嘛达尔扎没有交待延请从西藏来的喇嘛,图卜济尔哈朗不敢自作主张,没有答应,延请喇嘛一事只好作罢。^⑦对于第二个请求,喇嘛达尔扎认为此次以为其父做佛事这一乾隆帝认可的“大事”为名奏请入藏熬茶,必能获得允准,没想到仍然遭到驳斥和拒绝。^⑧乾隆帝认为喇嘛达尔扎之弟、前任

①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57,《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准噶尔使臣抵京日期片》,第2704页;458,《寄谕甘肃巡抚鄂昌等速令准噶尔使臣等赶赴京城》,第2705页;476,《预备迎接使臣事务片》,第2714—2715页;480,《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奏表》,第2718页;497,《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2729—2730页;《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五十三,乾隆十六年二月乙亥;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252页。

②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97,《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2730页。

③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99,《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第2731页。

④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97,《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2730页;499,《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第2731页。

⑤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497,《使臣瞻觐圣明时所降谕旨》,第2729页;499,《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第2731—2732页。

⑥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21,《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预计使臣至京日期折》,第2746—2747页;536,《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表文》,第2755页。

⑦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39,《使臣图卜济尔哈朗等朝觐时颁降谕旨记注》,第2756页;547,《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及使臣所奏事情折》,第2762—2763页;555,《颁于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第2767—2768页。

⑧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40,《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报会见使臣言语情形折》,第2757—2758页;547,《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及使臣所奏事情折》,第2763页;《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七,乾隆十七年正月戊子。

准噶尔首领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已经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在西藏熬茶做过佛事,不能再去做一次:

再尔奏遣人至藏之事,去年尔使臣额尔钦前来,以尔新袭位为辞奏请,朕即降旨;无换一台吉,即遣人入藏一次之理,故不准行。此次尔使臣图卜济尔哈朗又以追报尔老台吉噶尔丹策零为辞,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已为噶尔丹策零熬茶一次,今安得又遣人前往。若有十子,岂有十次遣人进藏之理?此皆不可能准行之事。^①

图卜济尔哈朗等无奈,只好无功而返。

3. 达瓦齐时期

此时正值准噶尔激烈内讧,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喇嘛达尔扎在伊犁被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袭杀,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此时,准噶尔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清廷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彻底平定准噶尔,更不可能同意准噶尔赴藏熬茶。达瓦齐继位后忙于打击政敌、巩固地位,迟至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才向清廷正式派遣使节,这是达瓦齐政权与清廷的唯一一次直接联系,也是准噶尔与清廷的最后一次正式通使往来。四月底,达瓦齐所派使臣宰桑敦多克等抵达清准边界,五月中旬在承德避暑山庄得到乾隆帝接见。^②达瓦齐此次遣使,一来为取得清廷对其继位的承认,二来为奏请进藏熬茶。先前准噶尔首领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被喇嘛达尔扎所杀,现在达瓦齐将喇嘛达尔扎废杀,因此他以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的合法继承者自居,遵照乾隆帝的“大事”原则,请求入藏为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熬茶诵经,振兴黄教。他以为这样便名正言顺。^③但是,由于达瓦齐废杀喇嘛达尔扎篡位,不仅继位方式不正当,而且既夺取了噶尔丹策零家族的权位,又断绝了噶尔丹策零子嗣。并且达瓦齐在境内迫害异己,祸及僧人。乾隆帝长期以来对噶尔丹策零颇怀感念,对其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和喇嘛达尔扎也较为宽厚。现在达瓦齐却以噶尔丹策零的继承者自居,奏请进藏,“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乾隆帝对此十分反感,严厉地斥责了达瓦齐的行径,指其为噶尔丹策零的“仇人”。^④因此达瓦齐此次遣使只是自讨无趣,徒劳而返。达瓦齐使者敦多克等六月中旬自北京起程返回。^⑤

自乾隆十三年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所遣熬茶使者自西藏返回后,清廷便不再允许准噶尔以任何理由进藏。准噶尔直至最终被清朝灭亡,也再未能进藏熬茶。

六、达瓦齐遣使赴拉达克熬茶

乾隆十三年后,因得不到清廷允准,准噶尔再也无法进入西藏熬茶礼佛、学经和延请喇嘛。无奈之下,准噶尔重又试图通过拉达克交通西藏,并前往拉达克熬茶礼佛。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初,喇嘛达尔扎在派遣使臣额尔钦、尼玛等到北京奏请赴藏熬茶之际,同时遣使到拉达克贸易,询问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黄教情况。当时在位的拉达克王彭措南杰将此奏报乾隆帝,引起清廷警觉。^⑥这一年

①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55,《颁予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之敕书》,第2768页。

②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72,《军机处为令准噶尔使臣火速前来及探询其密言事札付伴送之章京》,第2776页;583,《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接取达瓦齐之奏表事宜折》,第2783—2784页;593,《兵部尚书舒赫德奏闻询问使臣自彼处起程时日情形折》,第2791—2792页;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第253页。

③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85,《使臣敦多克所携达瓦齐之奏表》,第2785页。

④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587,《筵宴使臣等时所降谕旨记注》,第2786页;588,《达瓦齐所遣使臣朝觐时所降谕旨》,第2787页;598,《颁予准噶尔达瓦齐之敕书》,第2794—2795页。

⑤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606,《伴送使臣之主事索诺木为带使臣先行前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第2799页。

⑥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二,乾隆十六年二月乙亥。

秋,喇嘛达尔扎又派人到拉达克探听西藏消息。因年初进京奏请从西藏延请喇嘛未果,喇嘛达尔扎还通过拉达克王向七世达赖喇嘛请求从西藏选派喇嘛到准噶尔。七世达赖喇嘛没有同意,转告准噶尔可到北京延请喇嘛。^①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达瓦齐篡位后,忙于内争,暂无暇派人进京上奏,遂于乾隆十八年二月就近派遣额木齐吹扎布为首率领使团到拉达克熬茶,并探听西藏消息。乾隆十九年春,达瓦齐正式派遣使臣敦多克等进京朝贡,奏请入藏熬茶,却遭到乾隆帝严厉斥责,无功而返。当时又值准噶尔堪布喇嘛根敦达克巴圆寂,达瓦齐只得再派额木齐吹扎布为首率领使团于当年十月初重到拉达克熬茶,为圆寂的堪布喇嘛做佛事,借机打探西藏消息。这便是前引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多尔济等奏闻准噶尔额木齐吹扎布叶尔羌达尔罕伯克等来拉达克熬茶等情折》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萨喇善等奏报准噶尔吹扎布叶尔羌回子阿都尼萨尔等来拉达克熬茶贸易等情折》两件满文档案所反映之事。

达瓦齐遣使到拉达克熬茶,试图通过拉达克交通西藏,这可以说是准噶尔在衰亡之际为恢复与西藏的政教联系、振兴黄教所作的最后努力。¹⁷ 世纪初准噶尔皈依黄教后,西藏格鲁派对准噶尔的崛起和强盛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教僧人在准噶尔形成强大势力,成为准噶尔政权的一个基石和支柱。¹⁸ 世纪中叶准噶尔的衰落与清朝禁断准噶尔与西藏的往来及准噶尔黄教的衰落不无关系。西藏是藏传佛教圣地,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有着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西藏格鲁派上层成为相继崛起的满清王朝和准噶尔蒙古都极力争夺和拉拢的对象。在对西藏的角逐中,清朝最终取得胜利,准噶尔和西藏的联系被切断,唯有得到清廷允准,准噶尔才得与西藏交往。这对准噶尔的政教利益不能不造成严重损害。清准关系改善后,准噶尔虽曾三次获准进藏熬茶,但都是在清朝严密监视和防范下进行的。此后,准噶尔多次遣使北京奏请从西藏延请喇嘛到准噶尔弘教或者从准噶尔派遣僧人至西藏学经,并屡次请求赴藏熬茶礼佛,都被乾隆帝拒绝。虽然乾隆帝同意从北京派遣喇嘛到准噶尔弘教,终因对具体喇嘛人选未达成一致而未果。在此背景下,拉达克因独特地缘优势为准噶尔所重视,成为准噶尔借以交通西藏、恢复与西藏政教联系的唯一途径。准噶尔衰亡之际,拉达克又因藏传佛教兴盛,被达瓦齐视作可满足宗教需求的“圣地”,遣使前去熬茶礼佛。但时势的变化已不容准噶尔回旋。乾隆二十年(1755),在达瓦齐盟友阿睦尔撒纳协助下,清军平定伊犁,达瓦齐被俘,准噶尔灭亡。

[责任编辑:奥其]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乙亥。

Summary Remarks and Contents

Culture Stewardship Brings Achievement, Cohesion makes the Glorious: A Summary of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 60 years (003)

Solidarity and Struggle of All Nationalities;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Affair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 60 years (009)

About Lazang—Khan's Reestablishment the Order of Khoshut Khanate Luben Zhaxi(015)

At the survival crisis of the Gelugpa, Gushi Khan armed forces to cut off hostile forces and established Khoshut Khanate. sde—pa Sangjie Gyatso ends the Khoshut aristocrat's rule over Tibet through anonymous funeral, controlling Dalai Lama and poisoning Lazang khan. Faced with harsh situation, Khanate Khan starts to defend for the honor and rights, and re—establish Khanate's order, which establish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Qing Dynasty to unify multi—ethnic country.

From “bianchui”(border) to “bianjiang”(frontier): the change of concept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officials in management of Northwest SongPeijun(020)

Combing the most brilliant concept of frontier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Qianlong era,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examine the type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Frontier. The management of Northwest Frontier by 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officials is a typical model, the paradigm of the borderland studies can be thus abstracte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ions of bianchui (border) and bianjiang (frontier).

The Dzungarian Missions to Ladakhin Period of Dawachi Chen Zhu(033)

Dzungars sincerely believed in dGe—lugs—pa of Tibetan Buddhism in Qing dynasty. It was an important affair for them to go to Tibet to “boil tea” and pay respect for Buddha. Qing Empire had strictly prohibited the Dzungars to contract with Tibet, since the Tibet started to govern by Qing Dynasty. Af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ook a turn for the better, Dzungaria was permitted by Qianlong Emperor to go to Tibet to “boil tea” for three times. But after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allowed to enter Tibet. Ladakh was adjacent to Xinjiang and Tibet, and believed in Tibetan Buddhism with dGe—lugs—pa being flourishing, Dawaci dispatched envoys to Ladakh to “boil tea” and makes contract with Tibet respectively in the 18th year and the 19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after he became the khan of Dzungaria. This thesis researched the event thoroughly based on two pieces of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and other literatures of Qing dynasty.

Research on the Gogens of Dazhi Temple of Yekemingya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 Ao Jiapeng(046)

It has been unknown for Gegens of Dazhi Temple of Yeke mingy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heir stories for a long time. Basing on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field survey among the Mongols in Yeke mingyan the author deduces that the Gegen was shared by Dazhi Temple in Yeke mingyan and Qiande Muni Temple in Jalaid. That is to say the Gegen of Dazhi Temple in Yeke mingyan is also the Gegen of Qian de Muni Temple in Jalaid.

coytutaiji' s — TsogtuTaiji' s support for Legden khan' s converting into the Sakya Tibetans Buddhism